

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
攻城为下；
心战为上，
兵战为下。



白话诸葛亮兵法

古典名著今译读本

白话诸葛亮兵法

〔三国〕诸葛亮/著

毛元佑/译注



岳麓书社

责任编辑 丁方晓
封面设计 许康铭

白话诸葛亮兵法

毛元佑 译注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（长沙市河西新民路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

1995年7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3次印刷

字数：210,000 印张：9.25 印数：23,001—33,000

ISBN7-80520-608-2/E·8

定价：（精）11.00元（平）8.00元

湘新登字 007 号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（厂址：衡阳市马嘶巷8号 邮编：421001）

前言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

的确，历史是无情的。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沧海桑田，地覆天翻。岁月可以风蚀往事，时光能够冲淡记忆。然而，三国时期那段波澜壮阔、迭荡起伏、惊心动魄、瑰丽多彩的历史，并没有随着时代潮流的冲刷而烟消云散，被人遗忘，而是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，引起了后世长盛不衰、经久不息的浓厚兴趣。正如大型电视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的片尾曲所吟唱的那样：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铮鸣，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。湮没了黄尘古道，荒芜了烽火边城，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。曹操、刘备、孙权、司马懿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周瑜……他们如同群星璀璨，依旧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之中。而在这众多的明星中，诸葛亮无疑是最为闪亮耀眼的一颗。

诸葛亮（181—234），字孔明，东汉琅邪阳都（今山东沂南）人，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仕宦家庭。

诸葛亮可谓是不逢时，他的童年是在东汉末年社会大动荡中度过的。由于皇帝昏庸无能，大权旁落到外戚和宦官手中，导致社会黑暗，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，饿殍遍野。广大民众走投无路，被迫起而反抗。公元一八四年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、波澜壮阔的黄巾农民大起义。一时间“八州并发，烟炎烽火”。东汉统治者虽然倾全力镇压了起义，但自己也走向了穷途末路。伴随着东汉王朝的土崩瓦解、名存实亡，在镇压起义中起家的各地军阀纷纷拥兵自重，割据一方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拼搏厮杀。

诸葛亮的家乡，正是汉末战争风暴席卷之地。你来我往的混战，其直接结果是房屋变成瓦砾，百姓流亡死伤。早已丧失父母的诸葛亮，再也无法在家乡生活下去了。于是在十五岁这一年，他同两个姐姐及弟弟一行背井离乡，随同担任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了南昌。不久，又跟随叔父投

奔荆州的刘表。叔父死后，他就定居在荆州南阳郡邓县的隆中（今湖北襄阳城西）。

隆中，在襄阳城西约二十里处。山势连绵，树木葱茂，中有一山“隆然冲起”，称为隆中山。襄阳，在汉水、白河汇合处，南附江汉，西屏川陕，是南北水陆交通要道，也是当时荆州的政治中心和战略要地。诸葛亮在此隐居十年，并不是要消极遁世，甘当老死林泉的隐逸。在这个时期，除了“躬耕陇亩”外，更重要的是刻苦读书，广泛吸取各种有益的知识，并积极交结名士，密切关注当时形势。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他的眼界，增长了知识和才干，还大大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，博得了人们的好评，获得了“卧龙”的称号。隐居隆中时期，是诸葛亮一生中的重要时期，为他以后的从政仕宦作好了充分的准备。

诸葛亮就象是蛰伏在深山大泽的卧龙，一旦风云际会，就会腾入天空，叱咤风云。诸葛亮等待和期盼的际遇终于到来了，这个人就是刘备。

刘备，涿郡涿县（今河北涿州）人，原是汉朝宗室，但支系疏远，家世衰微。小时候穷途落魄，曾靠织草席、卖草鞋为生。十五岁时曾拜在当时名士卢植门下，学了一些儒家经典。但他“不甚乐读书”，而是喜欢结交豪侠名士。面对衰败的汉王朝，心中愤愤不平，立志复兴汉室，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。在黄巾起义爆发后，他和关羽、张飞结集了一支武装力量乘机而起。但在各派军阀混战中，由于“失势众寡”，屡遭失败，奔走了二十多年，依旧是一事无成，无奈只好投奔荆州的刘表，寄人篱下。刘表虽然表面上对他礼遇有加，但对他却暗怀戒心，只让他驻扎在小县新野，看守荆州的北大门，以防曹操南下。迭遭挫折的刘备并没有灰心丧气，而是暗中积极扩充实力，寻访贤才。经过当地名流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，公元二〇七年，刘备顶风冒雪，亲至隆中求见诸葛亮，“凡三往，乃见”。一段君臣相得、鱼水交融的千秋佳话就这样开始了。这一年，刘备四十七岁，诸葛亮二十七岁。

诸葛亮没有辜负刘备的一番苦心，他果真不凡，奉献给刘备的第一份厚礼就是被后世誉为千古一策的《隆中对》。在这个著名的对策中，诸葛亮首先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地理和人事各个方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：各地军阀势力经过混战和兼并，只剩下了曹操、刘表、刘璋、孙权和刘备等几个较大的集团。其中刘备的力量最弱，他曾投奔过公孙瓒、陶谦、曹操、

袁绍等人，一再被打败，身无立足的地盘，不得不依附荆州的刘表。除刘备外，这些集团可分为三种势力。第一种是控制东汉中央政权的曹操集团。曹操擒杀吕布、击降张绣、消灭袁术、打败袁绍，占领了全国十三州中的冀、幽、并、青、兖、徐、豫等州之地，基本上统一了黄河流域。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招揽了大量人才，恢复和发展生产，具有良好的物质条件，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势力。第二是称霸江东的孙权集团。孙权承袭父兄遗业，得到当地和南下地主的支持，既具有较好的经济条件，又有长江天险可以依恃，统治相当稳固，实力虽比不上曹操，但对局势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孙权虽偏处江东，但也企图向外扩展势力，伺机夺取中原。第三是守境自保的地方割据势力，如刘表、刘璋、汉中张鲁等等，割据一方，无所作为，不足以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。这三种势力的存在及其矛盾，是当时形势的特点。

诸葛亮从当时的形势出发，为刘备制定了夺取全国政权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。这一战略分为两个步骤：第一步是夺取力量薄弱的地带长江中上游的地方割据势力区域，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；第二步是一旦时机成熟，便兵分两路，成钳形攻势进击中原，完成统一大业。为达成这一战略目标，必须采取以下战略措施：首先夺取刘表占据的荆州和刘璋占据的益州，以此作为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；然后“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”，团结西南少数民族，建立稳固的战略大后方；在对外关系上，利用曹、孙两大集团的矛盾，在共同拒曹的基础上，“外结好孙权”，建成抗曹联盟，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。在内部政策上，“内修政理”，改革政治，积蓄力量，发展实力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便大举北伐，夺取全国政权。

“隆中对”是青年政治家诸葛亮的杰作，它为刘备集团规划出了一幅前景光明的蓝图，充分表现了诸葛亮超人的战略眼光，给苦苦摸索的刘备指出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诸葛亮的预见基本上是正确的，刘备集团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引下一步步走向成功。

大喜过望的刘备，于是恳请诸葛亮出山，辅佐大业。诸葛亮慨然应允，从此结束了隆中的隐居生活，追随刘备在变幻莫测的三国风云中，施展自己卓越的才能，积极从事政治、外交、军事等方面的活动，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、彪炳史册的历史活剧，为创建和巩固蜀汉政权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。

公元二〇八年，曹操在平定北方乌丸之后，挥师南下，直袭荆州。刘表的次子刘琮降曹，形势对刘备极为不利。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，便退奔江陵。途中，在当阳长坂一战，刘备大败，只得放弃江陵，退兵夏口（今湖北汉口）。当时，孙权拥兵柴桑（今江西九江），观望成败，或战或降，举棋不定。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刘备只有联合孙权，才有可能抗拒曹操。诸葛亮于是主动请缨，出使东吴。

这时曹操已夺取江陵，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，拥有大军号称八十万，气焰嚣张，派人向孙权下书，要求孙权投降，否则将挥师南进，踏平江东。大敌当前，东吴群臣丧魂落魄，纷纷主降，只有鲁肃、周瑜力主抗战。诸葛亮会见孙权之后，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，提出了联合抗曹的建议。他指出：曹军虽人多势众，但远道而来，疲惫不堪，又都生长北方，长于骑战，“不习水战”。而新降的荆州兵只是迫于形势，未经整训，战斗力也不强。反观孙、刘，兵力虽少，但以逸待劳，又惯于水战，如果联合起来，以己之长，克敌之短，同心协力，完全能够打败曹军。诸葛亮的分析，打消了孙权的顾虑，坚定了孙权的信心，促使孙权下决心联合刘备，共同抗曹，孙刘两家正式结成联盟。同年十一月，孙、刘联军五万，在赤壁（今湖北蒲圻县境）用火攻大败曹军，迫使曹操放弃南进打算，率军北归。刘备乘机占据了荆州江南的武陵、零陵、桂阳、长沙四郡。至此《隆中对》中部分目标已经实现，三足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。

公元二一一年刘备占领荆州以后，进一步实行《隆中对》既定的战略方针，留诸葛亮镇守荆州，自己亲自率兵入川，历时三年，占领益州。后又于二一九年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。至此，刘备占据了西南，有了进行统一战争的根据地。公元二二〇年，曹操病逝洛阳，长子曹丕称帝，建立了魏国。次年，刘备也在成都称帝，建立了汉国。这样，连同占有长江中下游的孙吴政权，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，《隆中对》中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第一步战略计划至此全部实现。

联吴抗曹，是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提出的一条重要的战略对策。可是正当刘备集团势力迅速发展之时，这一方针却遭到了破坏。荆州，是孙、刘、曹长期明争暗夺的一块地盘。赤壁大战后，孙权将荆州“借”给刘备，目的是为了利用刘备在荆州抵挡曹操，为东吴看守大门。但随着刘备势力的发展，孙权感到对自己构成了威胁，于是索要荆州，但遭到了拒绝，刘

孙联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痕。而镇守荆州的关羽，居功轻敌，不顾大局，违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原则，激化了孙、刘集团的矛盾。公元二一九年七月，关羽一举夺下被曹军占领的襄阳，把曹仁围困在樊城，擒于禁，斩庞德，“威震华夏”。在空前的胜利面前，关羽更加骄傲自满，放松了对孙权的警惕，结果荆州被孙权袭占。关羽挥军南返，败走麦城，最后被擒杀。致使诸葛亮原来跨有荆、益两路北伐的设想宣布破产。公元二二二年，刘备为夺回荆州，替关羽报仇，不听劝阻，出兵东吴，结果被吴将陆逊击败，退守白帝城（今四川奉节东），蜀军损失惨重，元气大伤，刘备羞愧交加，一病不起。诸葛亮由成都赶至，刘备临终托孤，要诸葛亮辅佐儿子刘禅。刘备死后，刘禅继位，称为后主。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，兼任益州牧。当时刘禅年仅十七岁，才能平庸，因此朝廷上下，无论大事小事，都落到诸葛亮一人身上。

诸葛亮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。夷陵惨败，使蜀军大伤元气，生产也遭到很大的破坏。荆州一失，地盘上只剩益州，实力远不及魏和东吴。以前的盟友东吴反脸成仇。大后方南中地区的几个郡，趁刘备新丧相继发生叛乱。内忧外患一齐袭来，蜀国犹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，随时都有被狂风巨浪吞没的危险。诸葛亮临危不惧，冷静地分析了形势，认为国家新遭大丧，不宜马上出兵镇压南中叛乱，于是采取了“抚而不讨”的怀柔政策，命令南部各处关隘加强防守，以控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。同时，从大局出发，派人多次出使东吴，重订盟好，恢复了友好关系，从而为后来的南征平叛和北伐中原解除了后顾之忧。

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，蜀国恢复了元气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富裕，军备充足，解决南中叛乱的条件已经成熟。南中地区，包括现在四川南部和云南、贵州等地，那里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，统称为“西南夷”。东汉时因深受压迫和歧视，因此民族关系十分紧张。刘备死后，益州豪强雍闿煽动夷族首领孟获发动叛乱。二二五年，诸葛亮亲自率兵南征。针对少数民族征而复叛的特点，采取了“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；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”的用兵方针，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，还实行政治争取，双管齐下，因而很快结束战争。此后，在南中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改划郡县，缩小郡区，削弱地方势力，加强中央集权；改善民族关系，大量录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；开发经济，发展生产。这些措施的推行，收到了“纲纪粗定，夷

汉粗安”的效果，达到了“南抚夷越”的战略目的，为北伐建立了稳定的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。

北伐中原，统一全国，是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提出的最终战略目标。为达成这一战略目的，诸葛亮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准备。在政治上，“内修政理”，革新政治。他针对益州前统治者刘焉、刘璋父子“威刑不肃”、养成地方豪强“专权自恣”的弊端，采取了打击豪强的严厉措施。与此同时，开诚布公，选贤任能，务求吏治清明、革除弊政。亲自主持制定了法典《蜀科》，亲自手写“八务、七戒、六恐、五惧”等条例，要求官吏们遵照执行。厉行法治，执法如山，赏罚严明，“赏不遗远，罚不阿近”，“科教严明”。在诸葛亮的治理下，蜀汉官吏大多能兢兢业业，勤于职守，力戒弄虚作假、干犯法纪之事，从而一扫东汉末年官吏贪残昏庸、浮华腐败之风，使蜀国吏治清明，吏风端正。“他所治理的汉国，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”，赢得了当时和后世的交口称誉。

在经济上，发展生产，增加财富，加强经济实力。从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夺取益州到刘备去世，整整十年之间，基本上是用兵不断。这期间诸葛亮虽然很少亲临前线指挥作战，但他坐镇成都，调拨兵马，提供军饷，支援前线，深刻体会到战争给民众造成的沉重负担。特别是关羽失荆州，刘备伐吴兵败，给新兴的蜀汉政权带来的灾难尤为深重，不仅使蜀汉国力大为削弱，也使蜀汉在三国分立的政治舞台上陷入被动困难的境地。所以在刘备死后的第二年，也就是在同东吴重修盟好之后，诸葛亮在整顿吏治的同时，提出了“务农殖谷，闭关息民”的政策。诸葛亮深知，只有让农民休养生息，“安其居，乐其业”，才能使农业生产发展起来；也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，才能养成雄厚的经济实力。唯其如此，才能向外拓展，去进行北伐统一战争。于是，诸葛亮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首先制定了减轻农民负担的“薄赋敛，无尽民财”的政策，取缔一切“妨害农事”的弊端，让农民安心从事生产。其次是兴修农田水利，最后发展盐铁、织锦和交通运输事业。这些措施使蜀国经济繁荣，国力增强，为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。

在军事上，大力进行“治戎讲武”活动，通过严格的训练和管理，以增强蜀军的战斗力。诸葛亮治军，特别重视严明军纪。他认为：“孙、吴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，用法明也”。因此，坚持以法治军，赏罚必信，有

功者“虽仇必赏”，犯法者“虽亲必罚”。由于“法令明，赏罚信”，蜀军纪律严明，“士卒用命，赴险而不顾”。诸葛亮重视军事训练，认为“有制之兵，无能之将，不可以败；无制之兵，有能之将，不可以胜”。要使部队保有较强的战斗力，必须治军严格和训练有素。因此，他十分重视军事训练，经常“教兵讲武”。八阵战法，就是诸葛亮“教兵讲武”的一种形式。他把军队编成各种不同的战术单位，各部相互配合，临敌制变，灵活机动，可战可守。“诸葛武侯治蜀，以八阵教阅战士”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。武器装备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，诸葛亮对军队的武器装备给予了高度重视。为解决山区运输困难，创制了木牛流马，主持革新了一发十矢的连弩等等。诸葛亮采取的上述治军措施，使蜀军“甲坚兵厉”，号令严明，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。

经过艰苦的战争准备，蜀汉社会稳定，经济发展，兵强马壮。诸葛亮觉得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便于公元二二七年向刘禅上《出师表》，率领诸军号称二十万北驻汉中，举行讨伐曹魏的战争。

汉中物产丰富，地形险要，是诸葛亮屯兵、屯粮的战略基地。从汉中北进必须通过五、六百里的高山险谷。当时可通谷口很多，主要有三个方向、五条通道。一是出秦岭入关中，有三条通道，即子午道、褒略道和褒斜道。这三条道谷长路险，均有栈道，行军困难。二是由汉中经阳平关（今陕西勉县西）、武兴（今陕西略阳），向西北迂回，由祁山（今甘肃礼县东北）出天水（今甘肃甘谷东），道路虽远，但行军与运输便利。三是由汉中沿沔、汉东下，迂回武关（今陕西商县东南）、峽关（今商县西北）、蓝田（今陕西蓝田西南），此道较远，且距魏腹心之地许、洛太近，易被切断归路。

公元二二八年春，诸葛亮开始了第一次伐魏。其进攻部署是：扬言由斜谷进攻郿（今陕西郿县东），令赵云、邓芝为疑兵，据箕谷（今陕西宝鸡东南），自率主力出祁山，其企图是先夺取陇右，次取关中，然后进图中原，并灭曹魏。曹魏方面虽在关中、陇右驻有一定兵力，但由于刘备死后“数岁寂然无闻，是以略无备豫”，没料到蜀军会大举进攻。直到诸葛亮扬言由斜谷道攻郿，魏明帝才遣曹真都督关右诸军驻郿。结果诸葛亮声东击西，亲率大军攻祁山，魏朝野恐惧，关中震动。天水、南安（今甘肃陇西东南）、安定（今甘肃泾川北）三郡叛魏应蜀。但魏明帝认为蜀守秦

岭要隘，难以往击，今出兵来攻，正可破之。遂命右将军张郃率步骑五万西拒诸葛亮，并于二月十七日亲至长安督战。于是蜀魏双方为争夺陇西展开了一场激战。蜀军一方面准备进攻尚未降服的广魏、陇西二郡，企图夺取整个陇右，同时集中一定兵力，准备迎击魏援军。魏军张郃部则迅速西进，越过六盘山与陇山之间的谷道，转锋南下，横渡渭水，直趋街亭（今甘肃天水东南街子口），威胁蜀军侧后，企图击败蜀军，夺回陇右。诸葛亮为保障主力翼侧安全，便于出兵，命马谡率前军进驻街亭。街亭位于渭河与麦积山之间，是关陇间的通道之一，战略地位重要。但马谡违背诸葛亮的指示，不据隘守险，反而“舍水上山”。张郃大军一到，直逼山下，先断水源，继之攻击，蜀军大败，士卒离散。马谡街亭之失，使诸葛亮大军“进无所据”，继续夺取陇右的战机已失，且翼侧受到威胁，加上赵云等在箕谷也因疏于戒备被曹真击败，于是退回关中。曹真、张郃迅速收复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。曹真判断诸葛亮在祁山受挫后下次必出兵陈仓（今陕西宝鸡东），遂派郝昭等守陈仓，加强防御。诸葛亮第一次伐魏至此结束。

诸葛亮兵败祁山后不久，东吴于五月份发兵攻魏，魏军主力东援，诸葛亮利用其关中空虚之利，于十二月率兵出散关，围陈仓，第二次伐魏。魏将郝昭在陈仓早有准备，据城坚守，以千余人抵御数万蜀军，以待援军。诸葛亮劝降不成，采用一切办法实施强攻，均未奏效。双方相持二十余日，蜀因仓卒出兵，粮食不济，而魏将张郃已率军日夜兼程赶来增援，诸葛亮决定撤退，魏将王双率兵追击，遭伏击兵败被杀。

公元二二九年春，诸葛亮第三次攻魏，派陈式出阳平攻取武都（今甘肃成县西北）、阴平（今甘肃文县西北）二郡。魏雍州（今陕西西安西北）刺史郭淮领兵往救，诸葛亮率兵进至建威（今甘肃西和北），郭淮退走。蜀军占领两郡，诸葛亮率主力退回汉中。

公元二三一年二月，诸葛亮命李严负责粮运，自率大军再出祁山，仍以陇右为目标，第四次伐魏。诸葛亮以一部兵力围困祁山，主力保持机动，准备与魏的增援部队决战。这时，司马懿已取代有病的曹真成为魏军主帅，司马懿指挥张郃、郭淮等部由长安西进，迎击蜀军。司马懿到达祁山时，诸葛亮主力已北趋上邽（今甘肃天水），并在途中击败了魏郭淮、费曜等部。司马懿率军奔救上邽，与诸葛亮相遇于郿东。司马懿根据蜀军运输困难、粮饷不继、难以持久的弱点，采取了凭险据守、坚不出战、与蜀

军持久对峙的作战方针。诸葛亮求战不得，引军向祁山方向撤退，以调动魏军，寻找战机。司马懿留兵一部守上邽，自率主力尾随逼进。当跟至卤城（今天水西南）时，魏将认为蜀军势孤粮少，纷纷请战。司马懿不得已，于五月初十派张郃部进攻祁山南面的蜀军。结果被魏延、吴班等击败，司马懿退回上邽，继续与蜀军对峙。六月，李严因大雨连绵，粮运困难，假借刘禅之命，令诸葛亮退军。司马懿派张郃追击，在木门（天水西南）遭蜀军伏击，兵败身亡，蜀军安然退回汉中。

公元二三四四年二月，诸葛亮集中兵力十万，开始第五次攻魏。蜀军进攻前，派人去东吴，约定双方同时攻魏。鉴于陈仓、祁山的魏军已筑城固守，短时间内难以攻克，因此诸葛亮的进军路线，选择在谷口尚未筑城的斜谷，企图突然进至渭水附近与魏军决战。四月，蜀军顺利出斜谷。但司马懿先期到达渭水南岸，背水列阵，坚守不战。诸葛亮求战不得，欲攻占北原（今陕西郿县与宝鸡之间，渭河北岸），隔绝陇道，又被魏将郭淮所阻。为了等待东吴行动并寻求战机，诸葛亮屯兵五丈原（郿县西南）一带，一面与魏军相峙，一面就地分兵屯田，作持久作战的打算。五月，东吴开始攻魏，孙韶率军向广陵（今扬州）、淮阴方向进攻，陆逊率军向襄阳方向进攻，孙权自率兵号称十万向合肥进攻。魏为对付吴、蜀大举进攻，采取了东攻西守的方针。魏明帝亲自率兵趋合肥对付吴军主力，同时令秦朗率兵二万增援司马懿，并令司马懿坚壁不战。七月，魏军主力进击围攻合肥的吴军，孙权见不能取胜，令三路吴军先后退回。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一百多天，蜀军多次挑战，魏军均不予置理。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“巾帼妇人之服”羞辱他，以激怒他出战，司马懿依旧按兵不动。当他获悉诸葛亮日夜辛劳、事必亲理、食少事繁等情况时，断定诸葛亮精力难继，活命不长，遂更加坚定了持久坚守、避免决战的方针。诸葛亮急于求战的企图终未得逞。八月，诸葛亮积劳成疾，病死军中，这次攻魏便告结束。蜀军由长史杨仪率领撤退。司马懿听说诸葛亮已死，蜀军撤退，率军追击，杨仪返旗鸣鼓，佯装进攻。司马懿以为诸葛亮诈死诱敌，遂引军退回，杨仪率军返回汉中。诸葛亮北伐至此结束。

蜀汉是三国中最弱小的政权，它的主要敌人是曹魏。曹魏的实力要比蜀汉强大得多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摆在蜀汉面前的战略抉择只有两个：一是依靠益州的地理条件，闭关守险，其结果很可能是“坐而待亡”。二是励

精图治，建立稳固后方，东联孙吴，削弱对方，壮大自己。诸葛亮选择的是后者。他竭尽一切努力内修政理，外联孙吴，南抚夷越，西和诸戎，以便北攻曹魏。这是一个奋斗自强，积极进取的战略，也是蜀汉得以生存并有希望获得发展的较好出路。但战争首先是交战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。诸葛亮最终未能实现目标的根本原因是双方实力相差悬殊。

从政治上，诸葛亮辅佐刘备父子二十八年，其奋斗的目标是“北定中原”，“兴复汉室”，直至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尽管他把蜀汉的内政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但“兴复汉室”的政治口号，在中原地区已经失去了号召力。曹魏政权建立后，革除了东汉的一些弊政，抑制了豪强，发展了生产，安定了社会生活，既取得了地主阶级的拥护，也得到了民众一定程度的支持，因此政治是比较稳定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诸葛亮仍然认为北伐是“据正道而临有罪”，显然已难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响应。从经济上看，蜀汉地盘狭小，连年争战，消耗巨大。诸葛亮屡次出兵，只能打打停停，不能持久作战。加上秦岭阻隔，交通不便，粮运困难，蜀军时有断粮之苦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曹魏则不但有关中的人力物力可就近利用，且关东的补给可沿渭河溯流而上，在人力、物力、士气方面都比蜀军优越。从军力上看，蜀汉经诸葛亮尽最大努力才建设了一支十数万人的军队，但既要留守后方，又要东防孙吴，加上部分军队轮休，每次投入作战的部队只有数万至十余万人。凭借这支军队，要北图中原，力量显然不足。曹魏除常年防守的大批军队外，仅机动部队就达二三十万人。双方的实力悬殊很大。此外，东吴与蜀汉虽恢复联盟，共同对魏，但戒心仍在，创伤未除。因此很难密切配合，和衷共济。因此，曹魏虽东西作战，两面受敌，但仍能应付裕如，压力不大。

另外，在作战指导上的不足也是诸葛亮未能实现夙愿的原因所在。首先是行动过于谨慎，不敢大胆出奇制胜。第一次攻魏前，曹魏对蜀军的进攻缺乏准备，关中兵少将弱，实力空虚，仅有数万兵力，分散于关陇各地，且有东顾之忧，主力不敢大量西调。在魏强蜀弱的总形势下，出现如此的有利条件，是难得的良机。如果采纳魏延的建议，以主力出陈仓或斜谷，以一部出陇右，以奇兵出子午谷袭击长安，然后东据潼关，西抚陇右，一举而定秦川，并非完全没有可能。但诸葛亮过于谨慎，以致将号称二十万之众的兵力麇集于祁山，坐失良机。当然，诸葛亮把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

祁山并非完全失策，因为“安从坦道”，“平取陇右”，可以绕开秦岭，进军快速突然，使魏军来不及救援。且如占据陇右，可就地解决部分粮饷，控制渭水上游。但斜谷一路只作佯动，未直插郿县和武功之间牵制魏军西援，结果给了魏调兵遣将之机。加上用人不当，导致街亭之失，最后无功而返。其次，频繁出兵，劳师疲民，削弱了自己。以弱小之蜀，攻强大之魏，如果不能每战有得，势必形成同对方拼消耗的局面，这在战略上是失策的。第一次攻魏既然失败，第二、第三次就不应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出兵，第四次不应重复第一次的进军路线，第五次北进有东吴的配合，本是难得的良机，但诸葛亮却把大军用于一个方向，被魏军退阻于五丈原狭小地区，兵力无法展开，同魏长期对峙，结果一无所获。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连续出兵，兴师动众，不仅未达目的，反而空耗了国力。

当然，诸葛亮在作战指导上，有失也有得，有不足之处，也有成功的方面。首先是在战略进攻方向上，选择了曹魏力量较弱的陇右和关中，这里离曹魏的腹心地区较远，魏军主力集中在关东，难以大量西援秦陇。因此，蜀军在这一方面出击，能避实击虚。其次是诸葛亮治军严整有方，部队行军扎营组织严密，战斗力较强，魏军往往无隙可乘。加上善于利用山地特点，设伏歼敌，因而做到了进则魏军不敢战，退则魏军不敢追，进退自如，始终处于主动地位，使魏军总是被动应付。结果虽未达成预期目标，但也没遭到的失败。

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诸葛亮最终虽未竟统一大业，但斯人已死，英名永存。就在诸葛亮刚刚去世不久，蜀国治下的许多地区便纷纷上书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祠庙。但“朝议以礼秩不听，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上”。直到蜀汉政权面临内忧外患、眼看快要灭亡之时，无论是统治集团中头脑比较开通的人士，还是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苦百姓，无不思念诸葛丞相在世时的功德，更加追怀诸葛亮。在这种蜀国上下缅怀诸葛亮、感愤国事的气氛中，为诸葛亮建立祠庙的事再次提了出来。刘禅迫于这种形势，于公元二六三年春，下诏为诸葛亮“立庙于沔阳”。极具讽刺意味的是，这座诸葛亮的祠庙刚刚建成，曹魏的兵马已兵临城下，这一年冬天，蜀汉就被灭亡了。

诸葛亮不仅受到蜀汉人民的爱戴和怀念，也得到了敌国对手的尊敬和佩服。司马懿早就称赞他为“天下奇才”。司马昭在灭蜀后，曾叫臣下

学习诸葛亮兵法。晋武帝司马炎还亲自向蜀汉降臣樊建请教诸葛亮治国之方。晋代开国的司马氏祖孙对诸葛亮的推崇，给后世开了先河。从晋代开始，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给诸葛亮升官晋爵，赐庙加号。晋封他为武兴王；唐封为武灵王，并赐庙；宋赐“惠英庙”，加号“仁济”；元代追封为“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”；明朱元璋在钦定“帝王庙”时，选从侍名臣三十七人，“忠武侯从焉”。到了清代，诸葛亮名声更大，身价更高，不但把许多纪念诸葛亮的胜迹古祠加以整修扩建，供人瞻拜，而且每年春秋祭祀祖庙，还以诸葛亮从祀。康熙皇帝赞叹诸葛亮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为人臣者，惟诸葛亮能如此耳。”乾隆皇帝亲自撰文，对诸葛亮推崇备至。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，历代士大夫争相为他著书立说，编纂文集，使歌颂诸葛亮，蔚然成为风气。

解放以后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，多次拨款维修成都武侯祠。尤其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又进行了较大修葺。大门内走道东侧的唐碑，至今保存完好，是唐人评价诸葛亮历史功绩的重要碑刻，一九五五年五月四日周恩来总理来祠参观时，曾说：“这个碑保存下来，有它一定的意义”。董必武、郭沫若在诸葛亮故宅题写了“卧龙遗址”、“诸葛草庐”的题词。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春节期间，陈毅元帅游览武侯祠后留下的题词，内容深刻，发人深省：“少时读《三国志》及杜诗，仰慕诸葛孔明之为人，稍长就学成都，游武侯祠，则昭烈墓（刘备墓）在其侧，人们敬慕孔明反胜昭烈，其何故也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，千秋公论，不随时俯仰。其余若人不能自立，欲依附光泽以自显，其速朽必矣。”

“诸葛亮大名垂宇宙”。诸葛亮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。千百年来，在人们不断的推崇、纪念和追思中，诸葛亮一步步脱离了真实的历史，走向受人顶礼膜拜的神坛，成为一位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、可以预卜未知、洞天彻地、呼风唤雨、神机妙算、用兵如神的神仙式的人物。尤其是罗贯中《三国志演义》出现后，时人“争相誊录，以便观览”，使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、聪明的象征。这种虚构、美化、想象而来的艺术形象，自然同事实上的诸葛亮相去甚远，有些甚至是大相径庭。

诚然，诸葛亮是一位军事家，在军事上的建树也是巨大的。史书记载，诸葛亮曾著有兵法五卷，司马昭在灭蜀后，曾命令陈懿学习诸葛亮兵法，可惜早已失传。后人根据诸葛亮用兵的理论 and 实践，撰写了诸如《武侯兵

法心要》、《将苑心法》等几十部兵法著作。其中也同样是良莠并存，真伪难辨，有必要进行一番辩证整理、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工作。正是本着这一宗旨，作者编辑整理了这本《白话诸葛亮兵法》。

本书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：一、便宜十六策；二、将苑；三、军令、兵要及其他有关文论及附录。

“便宜十六策”即治国治军的十六种原则方法，包括治国、君臣、视听、纳言、察疑、治人、举措、考黜、治军、赏罚、喜怒、治乱、教令、斩断、思虑、阴察等十六篇，基本体现了诸葛亮治国治军的一系列重大主张。

“将苑”，也称《心书》，共五十篇，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为将之道，包括兵权、逐恶、知人性、将材、将器、将弊、将志、将善、将刚、将骄吝、将强、出师、择材、智用、不陈、将诚、戒备、习练、军鑫、腹心、谨候、机形、重刑、善将、审因、兵势、胜败、假权、哀死、三宾、后应、便利、应机、揣能、轻战、地势、情势、击势、整师、厉士、自勉、战道、和人、察情、将情、威令、东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。多角度、多侧面地阐述了将领所应具备的各种品德、修养、能力和素质以及应该防止的弊端和恶习，堪称古代论述为将之道的集大成之作。

上述“便宜十六策”和“将苑”，是否为诸葛亮所撰，学术界说法不一。但考察书中内容，基本同诸葛亮思想、性格、文风一致。因此，可以认为是诸葛亮所作。

除了上述著作外，本书还包括军令、兵要及其他有关文论，这些文论反映了诸葛亮治军、用兵的具体主张，是诸葛亮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将其收入书中，作为第三部分。

附录部分是将《三国志》中“诸葛亮传”辑录收入。“诸葛亮传”记载了诸葛亮的生平事迹，有助于我们了解诸葛亮其人及其军事思想，因此将其作为附录收入书后。

本书体例包括提示、译文、原文、注释几个部分。提示为每篇的内容提要，扼要介绍本篇的主要思想观点；译文注意在忠实于原意的基础上，力争做到通顺流畅；原文以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出版的《诸葛亮集》为底本；注释是对文中出现的人名、地名、典章制度等进行简明注解。

走过千年风雨，历经世事沧桑，诸葛亮已从戏剧舞台走进现代社会，

并走出国门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。在这股经久不息的诸葛亮热中，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诸葛亮有所裨益。

毛元佑

一九九五年二月